

论一战对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影响

车效梅, 徐继承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摘 要: 20世纪, 中东面临的第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冲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中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战使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崩溃, 为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的基本形成奠定基础; 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出现, 世俗的民族主义在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蓬勃发展; 在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励下, 现代化的改革之风吹遍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阿拉伯半岛。三种因素交互作用, 使中东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关键词: 一战; 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K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07)06-0075-04

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矛盾复杂、冲突不断、局势动荡的焦点地区, 当前世界一些重大的问题都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探讨 20世纪中东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 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变迁的作用, 有利于对这些问题的追根溯源。

中东新格局形成, 现代民族国家疆界基本确定

进入 20世纪, 中东面临的第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冲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次大战为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在一战隆隆的炮声中崩溃, 成为战后中东新的格局出现的首要条件。首先, 形成英法主宰中东的新格局。奥斯曼帝国崩溃后, 其幅员辽阔的、横跨欧亚非的广大疆域成为一块充满诱惑力的权力真空地带, 挟胜利余威的英法, 乘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俄国十月革命后无暇他顾、美国孤立主义势力抬头后置身事外的大好时机, 迅速挺进中东, 改变了一战前英、德、法、俄、奥匈、意等诸强并举的局面, 形成了英法主宰中东的新格局。

虽然早在 18世纪末, 西方列强就涉足中东地区, 但是英法对该区大部分地区的直接统治则在一

战后。英法根据各自的实力和利益, 把这一地区划分为相互分离的政治区域, 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除了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等几个国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独立以外, 其余广大的中东地区, 相继沦为英法的委任统治地、保护国或半殖民地。这样中东的政治地图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按其政治性质, 大体上可分为两大政治区域: 北层政治区域和南层政治区域。北层政治区域包括土耳其、阿富汗和伊朗三个非阿拉伯民族主权国家; 南层政治区域又分为肥沃新月政治地带和阿拉比亚政治地带。新月政治地带包括从伊拉克起, 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等国。因这一地带“是英法两国生死攸关的势力范围”[1](P3), 所以两国都予以直接统治, 其中叙利亚、黎巴嫩属于法国的委任统治地; 巴勒斯坦属于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外约旦、伊拉克与英国有条约, 是英国的被保护国。阿拉比亚政治地带由阿拉伯半岛和英埃苏丹组成, 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其中有英国直接管理的苏丹, 也有受英国保护的波斯湾小国。从以上中东政治地图的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到, 英国是战后中东真正的主宰者, 法国只是配角。又由于英国在北层政治区域中, 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

收稿日期: 2007-05-06 基金项目: 山西师范大学 2006年教学改革项目 (2006JQYB049)

作者简介: 车效梅 (1964—), 女, 山西翼城人,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史学博士。

徐继承 (1978—), 男, 山西榆次人,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史学硕士。

朗拥有较大的势力,南层政治区域的新月地带是英法势力范围的中心,阿拉比亚政治地带是英国势力范围的薄弱环节。因此二战前德意和英法争夺中东的重点地区必然是北层政治区域,阿拉比亚政治区域则成为它们渗透的主要目标。

其次,基本上确定了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和共同地域的阿拉伯民族是中东地区人数最多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大阿拉伯民族国家是他们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是由于英法在瓜分殖民地时,把阿拉伯民族居住的地域人为地划分为一些相互分离的小地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后,这些地区获得了独立,建立了各自的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形成了近 20 个阿拉伯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和特殊的关系,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希望重新统一的要求,在二战期间及战后便表现为阿拉伯统一运动。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英法的划分在客观上有利于阿拉伯现代国家的形成,但是其后遗症却十分严重。英法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在划分时有意留下了一些争端,伊拉克与科威特、沙特与也门、巴林与卡塔尔、伊朗与伊拉克、伊朗与阿联酋、叙利亚与土耳其等国之间的边境纠纷问题;库尔德建立民族国家问题;黎巴嫩的民族和宗教问题等等。这些成为此后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为严重的是,1917年 11月 2日“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这个目标实现”[2](P26)的《贝尔福宣言》的发表,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的渊源。

二、民族主义运动进入新阶段, 民族国家体系开始形成

作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一部分的中东民族主义,从 20 世纪一开始就成为一种以独特性为基础的普遍的政治观念。经过一战和十月革命的洗礼,成为影响中东历史进程的最为活跃的、最为长久的因素之一,是塑造中东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

首先,一战后,在阿拉伯政治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其社会背景相当久远,正如阿拉伯学者阿卜杜·阿齐兹·杜利说:“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思潮……是阿拉伯人的意识发展的结果。这一意识在 1400 年前就开始迸发,在阿拉伯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澄清和阐明,并在现时代最终出现于自我认识。这种

自我认识表现为谋求重新振奋阿拉伯民族并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新的活力。这就是现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3](P67)。在 1915 年 5 月新月地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建立一个北到梅尔辛和阿达纳一线,南到印度洋,东邻波斯,西接红海、地中海的独立的阿拉伯帝国。[4](P109—110)并在 1916 年 6 月 5 日举行阿拉伯大起义。一战后,阿拉伯人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实体,是一个民族,而且必然形成一个国家[5](P341)的观点已被阿拉伯人广泛接受。但是这一崇高的愿望被一战后英法等列强在“分而治之”的政策指导下于 1920 年强加给他们的人为的边界撕得粉碎。处于英法委任统治和保护下的、被分封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外约旦等新的名称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从不愿接受这种人为的割裂,所以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思潮在阿拉伯世界盛久不衰。但是随着这些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的确定,各国在反对欧洲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

1902 年伊本·沙特夺取利雅得,1918 年乘奥斯曼帝国崩溃之机,借助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采取灵活而独特的征战策略,翦灭群雄。1926 年建立了一个“汉志、内志与归并地区王国”,1926 年 1 月,伊本·沙特在麦加大清真寺宣布为汉志国王。1927 年 5 月克莱顿将军代表英国政府与伊本·沙特签订了吉达条约,“英王陛下同意汉志、内志及其属地国王陛下全面、绝对的独立”[6](P216)。1932 年,这个占阿拉伯半岛绝大部分的国家改称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该国的建立对中东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使这个分裂、动乱的地区趋于稳定,而且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阿拉伯半岛东部发现大量石油后,它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处理境内的自然资源。

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遭到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反对,为镇压阿拉伯起义,英国付出了伤亡 2000 人,耗费 4000 万英镑的代价。为了便于自己的统治,1921 年 8 月,英国将费萨尔立为伊拉克国王,1922 年费萨尔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英伊条约》,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落入了英国人之手,伊拉克取得了名誉上的独立。后在伊拉克民族主义的不断压力下,1930 年 6 月,英国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英伊友好条约》,英国宣布正式结束委任统治,伊拉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1932 年在英国的支持下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

战后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与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1918 年 11 月 23 日

成立的华夫脱党在其党纲的第二条明确声明它的目的是“用合法、和平的手段,即同英国谈判的手段来实现埃及的独立”[7](P261)。经过三年多的华夫脱运动,终于迫使英国于1922年3月宣布埃及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国家,4月正式颁布了埃及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埃及宪法》,埃及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其次,世俗的民族主义在土耳其、阿富汗、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蓬勃发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本国的封建制度和民族的双重危机,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产生民主和民族自觉意识,一战后形成了新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潮和革命运动。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代替了一度作为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泛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最有魅力的意识形态。他们强调的是土耳其民族的特性,倾向于从种族起源、语言思维、国土疆界、共同的经济生活等角度来界定民族的构成,主张建立一个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国家;认为民族独立、主权和自由是天赋的,早在1919年5月16日凯末尔就指出:“面对这种情况(指国家即将被瓜分的危机)存在的唯一决策:那也是基于维护国家主权,无条件地独立和建立一个新的土耳其”,“土耳其……这样一个民族,如果当俘虏,我国的子孙就要毁灭。因此,或是独立或是灭亡”[8](P9)。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之下,土耳其打败了协约国支持的希腊军队,迫使协约国与之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成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和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互为因果的政治事件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思想受到重创,而且影响深远,“土耳其改建共和,足以表示世界历史中一大专制帝国的崩坠,这委实是德谟克拉希的最后的胜利”[9](P50)。

1919年2月28日,青年阿富汗派的政治领袖阿马努拉在其加冕礼上的致词中明确表示:“从现在起,阿富汗为自由独立国家。它不承认任何外国的统治权力。它应当拥有其他主权国家所具有的一切权力。”[10](P105)在经济落后、既无资产阶级、又没有无产阶级的具体条件下,该派举起了民族民主的旗帜,经过了“血战五月,声威远播,举世皆惊”[11](P536)的第三次抗英战争和长期的外交谈判桌上的折冲樽俎,阿富汗终于赢得了独立,从而成为一战后中东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

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1915年协定中有关沙俄在伊朗的特权,撤回驻伊朗北部的军队。这一行动促使伊朗的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起来。但是1918年8月《英伊协定》的签字,使伊朗实际上

变成了英国的被保护国,引起伊朗人民的共愤。正是在伊朗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下,伊朗国会拒绝批准这一协定。再加上国际上苏俄和美国的反对,1921年英军从伊朗撤出,从而结束了伊朗长达12年的外国军事占领时期。1925年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礼萨·巴列维发动政变,推翻了卡扎尔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

虽然,这个时期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还未取得独立,而取得独立的国家对西方殖民者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赖,但是这些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使现代中东国家体系初显轮廓,为二战后中东国家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表明中东开始觉醒,“其重大意义在于结束了从17世纪以来东方一国又一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开始了一国又一国起来革命而争取独立和富强的历史”[9](P4)。

三、现代化改革初见成效,民族国家得到巩固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改革互为条件、相辅相成。随着一战后中东独立国家的出现,现代化的改革之风吹遍了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阿拉伯半岛。有长期改革历史的土耳其,得风气之先,成为中东现代化潮流的中心。1918—1923年的民族革命战争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奠定了基础,战后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局势世俗化为改革的突出问题。为使土耳其走上富强之路,凯末尔在政治上从1922年11月开始,中经1923年10月,直到1924年3月的17个月中,采取了三项决定性的政治措施,即消灭素丹制,宣布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制,从而使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制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在法制上,1924年3月废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4月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的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共和国宪法,接着又颁布了以瑞士民法为蓝本的《民法》,以意大利刑法为蓝本的《刑法》,以瑞典诉讼法为蓝本的《刑事诉讼法》等等,从而使土耳其人民在法律领域内摆脱了宗教法的束缚,获得了现代人世俗化的生活环境。在文化教育上,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编写弘扬土耳其民族精神的历史教本,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规定学校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之下。……不仅提高了国民素质,使文盲下降10%,而且树立起土耳其的民族精神。在经济上,以国家主义作为其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通过鼓励民族工业、建立国营企业、保护关税等措施使其经济得到发展,民族独立得到巩固。凯末尔现代化改革的成功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性事件,它开创的土耳其现代化模式不仅奠定了土耳其成为中东最

世俗化的国家的基础,而且对后来中东国家体制的形成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礼萨汗登上王位后,决心像凯末尔那样进行改革[12],力图把伊朗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从维护君主制统治目的出发,在法律、教育、社会、宗教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些世俗的措施。这些行政改革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经济改革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法制改革把欧洲的法典引入了伊斯兰神权的社会,社会习俗改革表现出了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精神。

阿富汗独立后,血气方刚的国王阿马努拉决心通过改革推动阿富汗走上文明、进步的道路。在其执政的十年中,共发布100多项有关改革的法令法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由于对阿富汗落后的国情和改革的阻力缺乏充分的认识,其结果使改革成为一次脱离国情的、挫伤人民宗教感情的改革。虽有个别肯定之处,但终究是一次失败的世俗化改革。无论是土耳其的成功、礼萨汗的成效,还是阿马努拉的失败,从中东现代化的进程看,都标志着社会的变革和伊斯兰教的变迁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3](P12)

与上述改革同时进行的伊本·沙特非世俗化改革,是这一阶段成功改革的另一突破,他开创了伊斯兰现代化的模式。由于沙特阿拉伯是依靠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宗教复兴而建立的国家,它的缔造者伊本·沙特把伊斯兰教作为立国治国基础。在政治上反对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坚持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化,他身兼沙特国王和瓦哈比派的教长,集政权与教权于一身。在伊斯兰教教义和沙特家族统治利益的原则下,他积极引进现代观念与先进科学技术;在处理好与乌里玛关系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改革。为加强中央政权,1926年8月31日伊本·沙特公布了《汉志王国约法》,宣布汉志是一个“设有咨议机关的、内政外交独立的穆斯林君主国家”[9](P106),汉志王国的一切行政权由国王掌管,国王受伊斯兰教

法律约束;1927年8月下令废除游牧部落传统法,用伊斯兰教罕百里派取而代之;1931年6月颁布了沙特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法律文献——《商业法典》。伊本·沙特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建立的这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东方的伊斯兰现代化发展模式,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以上三种因素交互作用,使一战后的中东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 乔治·柯克. 战时中东[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2] (美) J. C. 赫里维茨. 中近东外交: 第2卷(1914—1956) [M]. 普林斯顿出版社, 1956

[3] 凯马尔·H. 卡尔帕特.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4] 乔治·安东尼. 阿拉伯的觉醒: 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故事 [M]. 贝鲁特, 1933

[5]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6] (叙) 莫尼尔·阿吉列尼. 费萨尔传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7] (英) P. J. 瓦提凯奥提斯. 埃及史 [M]. 伦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6

[8] (土) 卡密尔·苏. 土耳其共和国史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78

[9] 彭树智. 20世纪的中东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0] 格·斯捷波. 关于1919年阿富汗战争论文集,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19.

[11] 洪涤尘. 亚洲各国史地大纲 [M]. 南京: 正中书局, 1935.

[12] 彭树智. 礼萨汗在伊朗的改革 [J]. 史学月刊, 1988 (1).

[13] 彭树智.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Influence of World War I on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CHE Xiaomei XU Jinch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4 China)

Abstract World War I is the first overall strike on the Middle East. The effect is primarily expressed by four ways as follows: (1) The collapse of the gigantic Ottoman Empire established the border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2) When the Arab Nationalism came into being as a whole ideology, the mundane nationalism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non-Arabic countries such as Turkey, Afghanistan and Iran. (3) Inspired by the nationalistic spirit, the wind of modernized reform blew all over the Arabia Island, Turkey, Iran and Afghanistan. The above three factors interacted makes the Middle East step into a new period.

Key words World War I; contemporary national country;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